

# 普乐寺坛城考

Study on the Mandala of the Temple of Universal Joy in Chengde

李建红

*Li Jianho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3 Vol.25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三年 第二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普乐寺坛城考\*

## Study on the Mandala of the Temple of Universal Joy in Chengde

李建红

Li Jianhong

### 内容提要：

普乐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竣工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寺庙分前后两部分。前部是典型的汉式伽蓝七堂布局。后部是一座“吉祥轮胜乐智慧坛城”。此坛城由群房、方形城台、旭光阁三部分组成。群房现存基址与四门殿，方形城台及旭光阁保存完好。如果与清宫陈设档案对照，普乐寺坛城建筑内现有供像及陈设可谓十不存一。本文根据此寺坛城现状，结合相关档案、佛教经籍，试图对寺内坛城八塔、供像、部分陈设及相关佛事活动进行考述。

### 关键词：

普乐寺 坛城 陈设 佛事活动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Universal Joy (*Pule si*) began in 1766, the 31st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and was completed in 1767. It consists of two distinctive sections. The front part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an-style monastery layout, featuring seven structures. The rear part encompasses the Mandala of Samvara, which comprises three components: surrounding buildings, a square platform and the Xuguang Pavilion. While the surrounding buildings have now fallen into ruins, the square platform and the Xuguang Pavilion have been well preserved. However, a comparison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Interior Setting Archives of the Qing Palaces* reveals that most furnishings and statues in the Mandala no longer exis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Buddhist texts,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explor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andala, including its eight pagodas, statues for worship, and parts of the interior settings, furnishings, and associated Buddhist activities.

### KEYWORDS:

Temple of Universal Joy (*Pule si*), Mandala; interior setting and furnishing, Buddhist activities

\* 本文为2023年度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33072。



图1 普乐寺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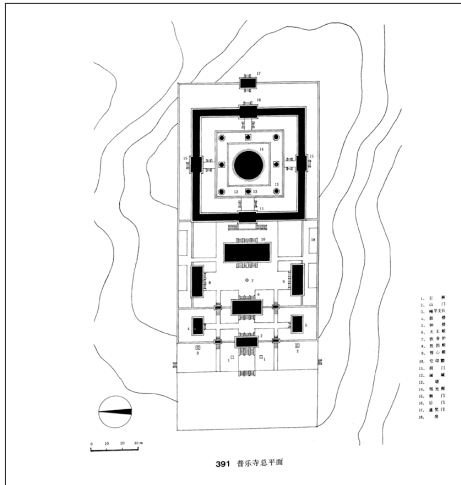


图2 普乐寺总平面图《承德古建筑》

普乐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东部山麓台地，庙址坐东朝西，寺东直指磬锤峰。〔图1〕其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占地约1.8公顷，分前后两部分。前部是典型的汉式伽蓝七堂布局，后部是一座坛城，由群房、方形城台、旭光阁三部分组成。〔图2〕群房现存基址与四门殿，方形城台及旭光阁保存完好。根据清宫陈设档案记载，当年坛城内供奉有佛像、佛画以及供法等，现大多无存。本文主要依据寺内坛城现状，结合相关档案与佛教经籍，对坛城市群房、八塔、供像、部分陈设及相关佛事活动进行初步考述。

在考述之前，首先对普乐寺的修建缘起作以说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寺庙选址及坛城的内容与形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普乐寺工程告竣。关于建寺原因，除了乾隆帝亲撰《普乐寺碑记》中所说“惟大漠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sup>1</sup>除为了怀柔蒙古各部而继续修建的一处瞻礼场所外，还关乎乾隆帝本人的宗教信仰，这在土观活佛为其师三世章嘉所写的传记中说得非常清楚<sup>2</sup>：

在热河御花园（避暑山庄）前面的山头上，有一个状如男性生殖器的突起的山峰（磬锤峰），前辈章嘉阿旺罗桑却丹说那座岩峰是大自然天的依止处，在那个险要处还有一座吉祥轮胜乐智慧的坛城。这个故事传到大皇帝的耳中，遂让章嘉国师在那座岩峰的对面建立一座胜乐立体坛场以及佛堂。章嘉国师奉命建立了供有胜乐天众，约有十五岁童子身量的佛像所居的立体坛城及佛殿。由章嘉国师主持，我等僧众举行了开光典礼，大皇帝也列席集会，参加了规模盛大的胜乐会供轮活动。

可见，普乐寺之所以选址于磬锤峰对面，是因为这里是“大自然天的依止处”，并且还有一座“吉祥轮胜乐智慧的坛城”。

坛城，梵文音译为曼荼罗，有诸佛聚集，轮圆俱足之意。“大自然”，就是印度教神灵湿婆，其化身之

1 （清）弘历：《普乐寺碑记》，此碑置于普乐寺群房西门殿内。

2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一是林伽。在古印度，其被认为是万物之本，以人之男根为天神而祭祀。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留学期间，经过“劫比他国”（今印度北部邦的法鲁卡巴德）时，曾对当地人们崇信的大自在天有所记载：“至劫比他国，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余尺，中有天根，形极伟大。谓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为鄙耻，诸国天祠率置此形。”<sup>1</sup>密宗经典《胜乐续》中也有记述：“于自在天男根自然生成之所在，瑜伽师若善加修持可以速成”<sup>2</sup>。西藏密教认为林伽本身就是修行所依的身坛城，因此二世章嘉活佛才会有磬锤峰为大自在天依止处之说。

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胜乐金刚还是乾隆帝的本尊神。约在乾隆十年（1745），三世章嘉国师为乾隆帝传授了“胜乐铃五种”灌顶法。灌顶时，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乾隆帝自己则坐在较低的坐垫上，直到灌顶结束，他一直跪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如律听受教法<sup>3</sup>。此后，章嘉国师成为其金刚阿闍黎。因此，当“师徒”二人听到和看到承德有那么一处修建胜乐坛城极佳的天然景观时，便规划设计了这座普乐寺。

“咨之章嘉国师云，大藏所载，有上乐王佛，乃持轮王佛化身，居常向东，洪济群品。必若外辟重闾，疏三涂，中翼广殿，后规闾城，叠磴悬折，而上置龕，正与峰对者，则人天咸遂皈依。”<sup>4</sup>

这是《普乐寺碑记》中的一段话，其中“外辟重闾，疏三涂”是指外设两道围墙，以清除、远离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中翼广殿，后规闾城”是指普乐寺中建宗印殿，后规划一座坛城。“叠磴悬折，而上置龕，正与峰对者”，即沿着悬折的台阶登上（坛城），其中置以佛龕，正与磬锤峰相对。由此可知，普乐寺内的主要殿堂与陈设都是根据章嘉国师所说的佛教经典而精心营建成造的，以期达到“人天咸遂皈依”佛法之目的。

至于碑文中所说“大藏所载”，应是指依据《大藏经》之记载。在《西藏大藏经·甘珠尔》中收录有关于胜乐曼荼罗经典《胜乐本续》。“胜乐系经”在古印度十分流行，形成了诸多流派。传入西藏后，受到多个教派的重视。在格鲁派中，胜乐与金刚怖畏、秘密集会并称格鲁派的三大本尊之一<sup>5</sup>。清代皇室尊崇、扶植格鲁派，此三大本尊多供于清宫重要佛堂及皇家庙宇中。特别是胜乐金刚作为乾隆帝的本尊神，专门建立、绘画胜乐金刚曼荼罗，举行坛城修供活动，以满足其宗教信仰需求。

以《胜乐本续》为依据的曼荼罗文献及图像，于19世纪被萨伽派高僧蒋阳·洛特旺波收入到藏文曼荼罗文献《续部总集》中，其中胜乐曼荼罗有15种，而鲁易巴传62尊曼荼罗（以下称62尊曼荼罗）在西藏密教现存实例中最多，影响也最大。其曼荼罗构造是以胜乐与金刚亥母为中心，由内到外依次是大乐、心、语、意、三昧耶五轮，各轮之间呈同心圆排列，均布列多位尊神。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张雅静博士，已将

1 （唐）道宣，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华书局，2014年。

2 阿旺伦珠达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30页。

4 （清）弘历：《普乐寺碑记》。

5 张雅静：《续部总集中的胜乐六十二尊曼荼罗》，《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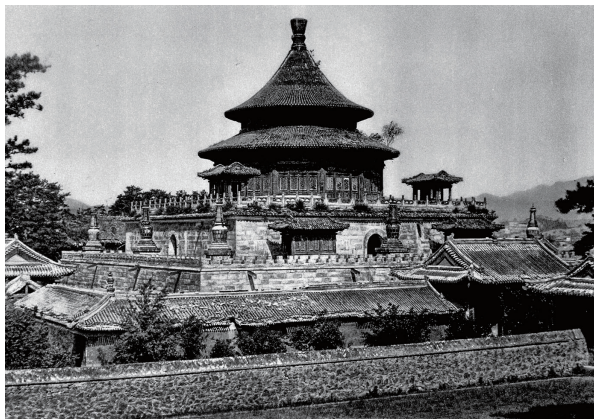


图3 普乐寺老照片《寻访1906—1909：西方人眼中的晚清建筑》  
德国建筑师：Ernst Boerschmann



图4 北侧围房基址

其仪轨进行翻译并作精彩分析、论述，本文亦以此曼荼罗作为考述普乐寺坛城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sup>1</sup>。

普乐寺的胜乐金刚坛城位于寺院后半部，被乾隆帝称为“闍城”。与前部平坦的地势相比，这里以条石砌筑起3.36米高的金刚墙，形成坛城最外围且高起于前部建筑，十分醒目。其平面构图是一个三层正方形，由群房、方形城台、旭光阁三部分组成，下面按照从外及内的顺序，进行考述。

## 一 群房及其陈设

在金刚墙两侧中央设有左右对称的蹬道，沿蹬道可到达群房。群房呈正方形，共68间，由四侧居中的门殿及东、西、南、北围房组成。参照老照片<sup>2</sup>〔图3〕，可知中三门间殿檐要略高于两侧围房。这里也是坛城第一层及最外围的区域，与坛城中央的方形城台合围成一个小院落。现仅存4座门殿及围房基址。〔图4〕〔图5〕

### （一）西门殿

坛城西侧的门殿在档案中称为西红门，即：

西红门一座(计三间,檐外挂)御笔真如境陡匾一面，  
内御笔四样字石碑一座。明间东托枋面西挂御笔字粉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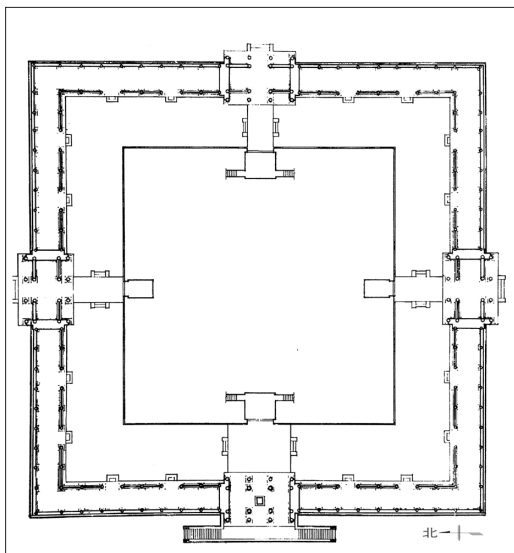


图5 坛城一层平面图《承德古建筑》

1 [德] 恩斯特·柏石曼，沈弘译：《寻访1906—1909：西方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2 [德] 恩斯特·柏石曼，沈弘译：《寻访1906—1909：西方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图6 真如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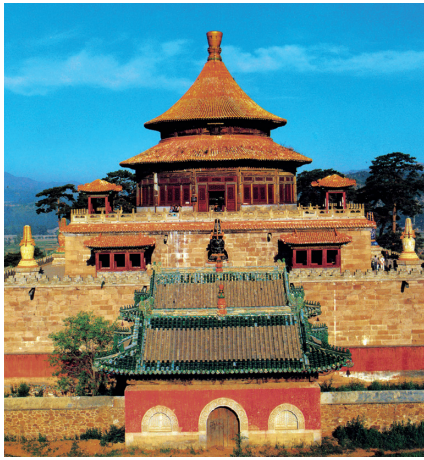


图7 通梵门

匾一面,明间西托枋面东挂御笔字粉油匾一面。<sup>1</sup>

西红门是坛城的入口,门额有乾隆帝御笔“真如境”三字〔图6〕,喻示着从此门进入,便到达清净圆成之法界。其内设石碑一座,刻有乾隆帝御书汉、满、蒙、藏四体文《普乐寺碑记》。当年高悬的两面御笔粉油匾已无存。

## (二) 东门殿

坛城东侧的山门名“通梵门”〔图7〕,面阔三间,与“大自在天的依止处”——磬锤峰相对。当年,此门主要陈放举办胜乐金刚道场的执事、法器、经书及常用物品。执事有妆缎伞、锦缎扇、筒子幡、旗、豹尾枪等<sup>2</sup>。应用物品、供法器、经书等详见(表一):

表一 通梵门应用物品、供法器、经书一览表<sup>3</sup>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朱红油高桌(随黄缎套6件)	6张	朱红油经桌(随黄布套62件)	62张
经袱子	62件	博浪鼓(随飘带)	62件
黄布坐褥	62件	五佛冠(随葫芦帽飘带62份)	62份
铜铃杵	62份	提炉	1对
把炉	1件	木斗	1件
大喇叭	1对	铜把盅	2件
乌布藏经铁炉(随盖)	1件	铜水盅	120件
小铜海灯	15件	铜水瓶	1对
铜锣	1面	铜满达	1件
大铜盘	1件	小铜盘	1件
大洞	1对	小洞	1对
铙钹	各1对	唢呐	1对
大小锡壶	2把	铜嘎布喇	2件

1 《清宫热河档案 8》,《普乐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544页。

2 《清宫热河档案 8》,《普乐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第544页。

3 《清宫热河档案 8》,《普乐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第544页。

(续表一)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大小镜	2面	大把鼓(随锤)	10面
大乌布藏经	5本	上乐王佛经	62本
西番首楞严经	一份 (计181页)	大藏四体全咒经	1份 (计10部)

以上经桌、桌套、经袱子、博浪鼓、坐褥、五佛冠、葫芦帽飘带、铜铃杵、《上乐王佛经》皆为62份(本)。根据北京圆明园“清净地”胜乐道场每年都有固定时间举行唪经活动来推测,普乐寺参与诵经的僧人至少有62名。

### (三) 南、北门殿

南北围房现仅存两侧中三间门殿,其余皆为基址。当年明三间陈设完全按照清帝园居殿堂来布置,以南围房为例,其陈设如下<sup>1</sup>:

南围房五间,明三间西山墙设床一铺(计三张);白毡一块;石青缎边红锦缎心靠背一件;黄庄缎坐褥一件,左设紫檀嵌玉如意一柄,右设红金漆痰盒一件;山墙上贴安德义画挑山一张,观保字对一副;南北设床四张(随青缎边红毡心床套四件);东壁墙贴:钱维城画横披一张(下设)洋漆琴桌一张,松绿磁双叶瓶一件,古铜熏炉一件,雍正款均釉双耳瓶一件。假门上贴弘旻画一张;东二间靠山墙设床一铺(计三张);白毡一块,竹帘一架。

对于弘旻、钱维城、于敏中等皇室成员、文臣交来的字画,乾隆帝都有具体的装裱要求: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太监吕进忠来说首领董五经交御笔绿绢字横披一张(碧静堂),弘旻宣纸画二张(普乐寺),传旨俱托贴其绿绢横披,外镶一寸宽蓝绫边。钦此。<sup>2</sup>

八月初七日,太监吕进忠来说首领董五经传旨普乐寺行宫现钱维城画横披一张、于敏中对一副、阿克章阿画条一张、观音对一副,俱外镶一寸宽蓝绫边。钦此。<sup>3</sup>

此外,围房桌上还陈放着珍贵器物,如雍正款钧釉瓷双耳瓶、古铜熏炉、紫檀木冠架等。床铺上面放红金漆痰盒与紫檀嵌玉如意,象征着事事如意。如此陈设布局,令人想到文人学士所追求的“明窗净几,悠然

<sup>1</sup> 《清宫热河档案8》,《普乐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第544页。

<sup>2</sup> 《清宫热河档案2》,《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第63、64页。

<sup>3</sup> 《清宫热河档案2》,《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第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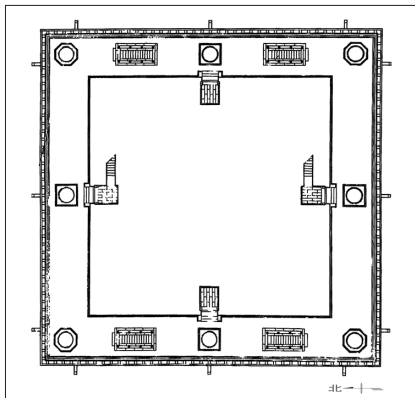


图8 坛城二层平面图《承德古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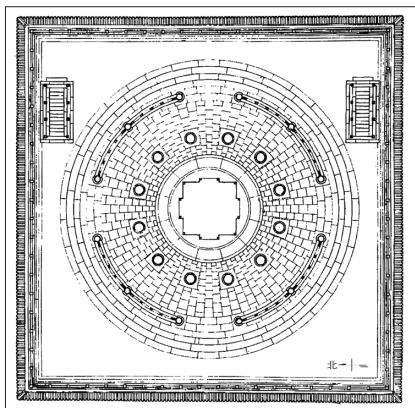


图9 坛城三层平面图《承德古建筑》

入座”之境界。显然围房的功用同北京圆明园清净地东侧的法源楼一样<sup>1</sup>，是皇帝在佛事活动之余，休息、颐养性情之所，活计档案中所记“普乐寺行宫”亦可印证这一点。

## 二 方形城台

群房环抱的正中位置是方形城台，共两层，即坛城的第二层与第三层。二层城台44.4米见方，高7.2米〔图8〕，四个方向正中开四门，东门石匾刻乾隆帝御笔“须弥臻胜”，西门石匾刻“舍卫现祥”。台上四角和四正面建有8座琉璃藏式佛塔。二层城台与外围群房组成正方形庭院；三层城台32.8米见方，高6.6米〔图9〕，城台四周环以石栏杆，旭光阁位于中央。二、三两层上下开八个券门，其内有石阶可通往台顶，出口处建遮风挡雨的风雨亭。

### （一）八塔

八塔位于二层方台的四角与四正方中央，皆为藏式琉璃砖釉面佛塔。〔图10〕塔基为五层仰莲瓣，塔瓶开一小龛，饰“十相自在”。塔顶为十三相轮，饰塔珞。塔下是雕刻莲花、法轮等纹饰的石质须弥



图10 方形城台二层八塔之一

图11 方形城台二层北侧琉璃塔，老照片《寻访1906—1909：西方人眼中的晚清建筑》  
德国建筑师：Ernst Boerschmann图12 方型城台二层东侧黑色琉璃塔  
摄影陈东

1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542页。



图13 上乐王佛坛城唐卡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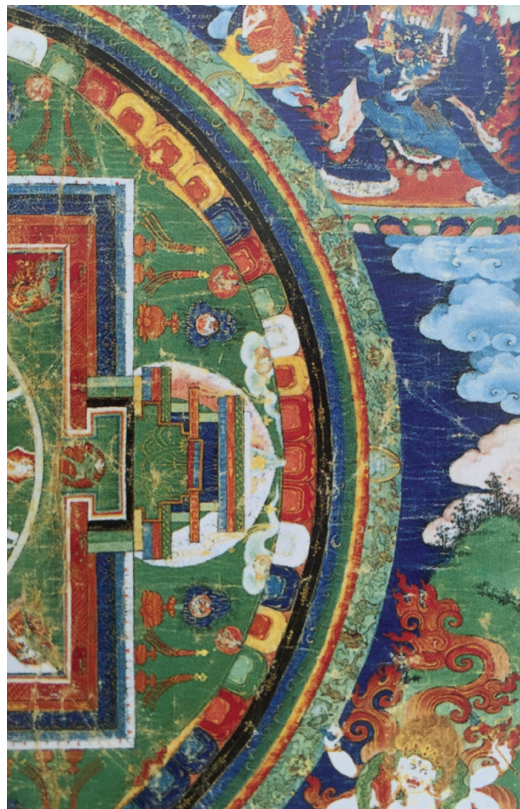


图13-1 上乐王佛坛城唐卡细部 故宫博物院藏

座，其中四角塔为八边形石座，塔身白色。四正向塔为正方形石座，塔身为西紫，东黑，南黄、北蓝。根据德国建筑师伯施曼拍摄的老照片，可知佛塔顶端原有仰覆伞状顶饰、月牙、太阳圆盘和滴焰。〔图11〕承德市文物部门于2015年完成此八塔的塔刹补配工程。〔图12〕

看到这八塔，首先会想到藏传佛教寺院中多见的善逝八塔，但从外形上看，此八塔塔基不具有善逝八塔富于变化的特征。根据《续部总集》收录的胜乐62尊曼荼罗作品及其仪轨，可知曼荼罗宫殿外火焰鬘外围有八大寒（尸）林，其中有八大佛塔<sup>1</sup>。这八塔在清宫藏“上乐王佛坛城”唐卡中也可清楚看到<sup>2</sup>。〔图13、13-1〕据此推测同为胜乐金刚坛城内的普乐寺八塔也应象征八大寒林。

## （二）八幅金刚佛画

方形城台有上下券门八座，二层券门宽2.5米，高2.9米。〔图14〕三层券门宽2.1米，高2.7米。〔图15〕清宫陈设档案记载，当年券门内悬挂有画像金刚八轴。另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谕旨可知，此八轴金刚佛画系乾隆帝来热河拈香或举办道场之用。佛画的绘制工作开始于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五日，经办官员有热河总管永和、中堂英廉、多罗恭敏郡王等，绘制工作由中正殿喇嘛承担。在领取、购买绘画颜料后，首先

1 张雅静：《续部总集中的胜乐六十二尊曼荼罗》，第497页。

2 王家鹏：《藏传佛教唐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第217页。



图14 方形城台二层券门



图15 方形城台三层券门

要绘出画样，呈御览后，乾隆帝谕旨“准收小绘画，其护法不必收小，得时俱镶锦边，安紫檀木轴头。”<sup>1</sup>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于九月初八日，中正殿喇嘛画得普乐寺护法佛像八张。由于券门墙壁面积不同，佛画有大小两种尺寸：大一点的四轴，净心各高8尺2寸7分，宽5尺9寸，合见方尺是195尺1寸7分2厘；小一点的四轴，净心各高7尺零5分，宽4尺6寸1分，合见方尺是

130尺零2厘。八轴共合见方尺325尺1寸7分4厘<sup>2</sup>。呈乾隆帝御览后，谕令：“普乐工程明岁夏初未必能完，暂将此画像八张交永和收供，俟明岁驾幸热河时再行成做。”<sup>3</sup>说明普乐寺这一年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因此普乐寺八轴佛画要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继续成做。

八轴金刚佛画现已不存，清宫档案中也未见到其尊名记载。但根据普乐寺坛城八塔所象征的八大寒林来推测，八幅佛画主尊很有可能是每个寒林中的护方神，即：帝释天、阎魔、水天、夜叉、自在天、火天、罗刹、风天。二层方台的八塔与八轴金刚佛画的供奉，表明此区域代表胜乐金刚坛城宫殿的外围，象征着八大寒林。

### 三 旭光阁

在三层平台的中心，是坛城的主体建筑旭光阁〔图16〕，其匾额悬挂在上檐之下正东方，阁名有迎接曙光之意。东面磬锤峰之顶端恰好在阁对面山坳处突现，更强调了这条轴线的意义。〔图17〕乾隆帝作佛偈赞曰<sup>4</sup>：

东峰开妙鬘，宝阁照旭光。举似日出处，了了正知见。光与日无尽，谁识所本来。八宝庄严成，香华天乐备。大会启无遮，同证无上道。

1 《清宫热河档案 5》：《乾隆四十六年接奉信贴，造办处承做热河活计档》，第 62 页。

2 《清宫热河档案 5》：《乾隆四十六年接奉信贴，造办处承做热河活计档》，第 62 页。

3 《清宫热河档案 5》：《乾隆四十六年接奉信贴，造办处承做热河活计档》，第 62 页。

4 （清）弘历：《普乐寺碑记》。



图16 普乐寺旭光阁



图17 普乐寺旭光阁内望磐锤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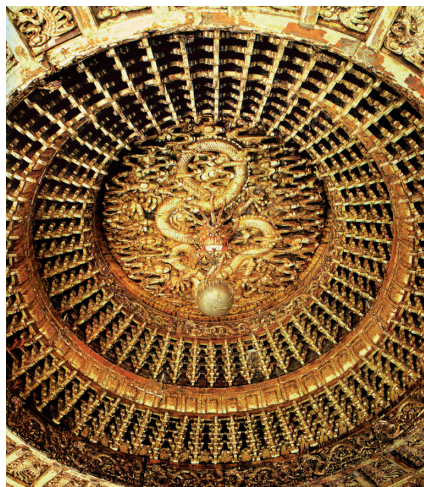


图18 旭光阁龙凤藻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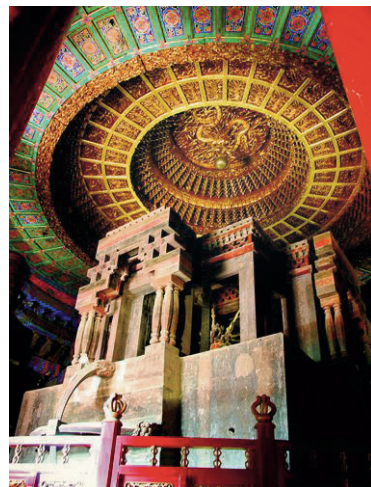


图19 旭光阁木坛城

佛偈表达了乾隆帝在这里修证悟道的感受与心情。旭光阁全部采用清官式木构做法，与天坛祈年殿做法相近。阁内有檐柱、金柱各12根，环布成两个同心圆。檐柱支撑下檐，金柱支撑上檐。每层檐都铺有黄色的琉璃瓦，顶部冠以巨大的铜镏金宝顶。阁身下部沿周圈砌高一米左右的青砖槛墙，石墙内侧彩绘龟背锦和夔龙图案，墙上周圈开红色描金菱花窗。阁内圆形龙凤藻井极其精美华丽，中央悬有蟠龙戏珠，采用层层缩小的三层重翘重昂九踩斗拱，雕工细腻，金光四射。〔图18〕

### （一）木制坛城的构成与纹饰

旭光阁内中央供奉一座大型木制坛城〔图19〕，代表了普乐寺胜乐金刚坛城平面的核心区域，由多个大小不等的木块、梁柱组合拼制而成，其内部构造与观修胜乐金刚坛城中的宫殿样子基本相符<sup>1</sup>。

1 [美] 费迪南德 D. 莱辛著，向红笈译：《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中国藏学出版社，第 15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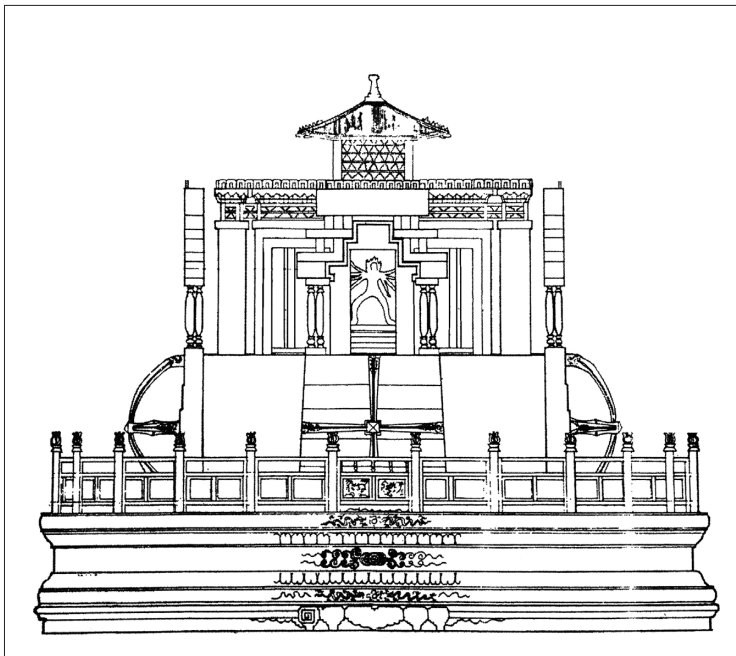


图20 旭光阁木坛城立面图《普乐寺》



图21 旭光阁木坛城须弥座顶端火焰鬘《热河》

坛城坐落在直径达7.6米的圆形石须弥座上。〔图20〕须弥座顶端外沿原有保护坛城的火焰鬘<sup>1</sup>〔图21〕，现为后制作的木围栏。其内是一圈边缘雕刻莲瓣纹的圆形基座，即是坛城宫殿的基座。上面有高2.1米，每边长5.09米的折角方形木供台。四面伸出金刚杵的杵头，表示坛城宫殿下方的羯磨杵，四种颜色，东黑（蓝）、西红、南黄、北绿。羯磨杵杵尖朝向四方，成为整个坛城宫不可撼动的支撑物。木供台顶端四角位置开有月牙形通气孔，其上为方形宫殿，宫殿四面正中开牌楼，过牌楼即是门枋。在门枋上部有横梁相连，其上搭建一圈露孔围墙。由于门枋之间无门，加之不设窗，所以这座宫殿很像一座敞亭，从内向外看去，旭光阁梁枋的精美彩画便映入眼帘，产生极佳的背景效果，衬托着坛城更加庄严。

此外，在宫殿的牌楼、门楣、八棱形门柱以及隔板上彩绘有人物、动植物图案。经过仔细辨认，尚可看清楚有24位金刚力士〔图22〕，12条龙，12只凤凰，8只狮面兽。门枋还绘有缠枝莲纹、灵芝仙草、花卉、卍字龟背莲花锦纹、如意云组成的金刚杵形纹等，色彩以蓝黑地描金、红地描金为主。〔图23〕值得注意的是在凤凰纹图案右上角分别绘有日、月图案，据此可区分为一凤一凰，一雄一雌，象征了阴阳与和谐祥瑞。〔图24〕狮面兽绘于八棱形门柱上，呈立姿，仰头吞吐一串宝珠，双脚同样踏着一串宝珠。其面部与铺首衔环的龙子椒图极为接近，大概有驱邪守卫的作用，抑或与曼荼罗入口户牖的动物形象有关。〔图25〕

进入宫殿，内有一八瓣莲花形地台，上竖立着八根绘有蓝黑色莲纹的方形木柱，其所支撑的殿顶由纵横木梁（金刚梁）隔成九宫格，中部方井四周搭建露孔围墙〔图26〕，之上又突出一座方形小殿，攒尖顶，殿脊三条，分饰脊兽五只。九宫格方井〔图27〕正中天花绘龙纹，突出了此坛城的建造主题，体现出皇权的至

1 [日] 关野贞、竹岛卓一编：《热河》第三册，东京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昭和九年版。



图22 旭光阁木坛城彩绘之金刚力士



图23 木坛城彩绘图案



图24 旭光阁木坛城彩绘之凤皇



图25 旭光阁木坛城彩绘之狮面兽



图26 旭光阁木坛城宫殿木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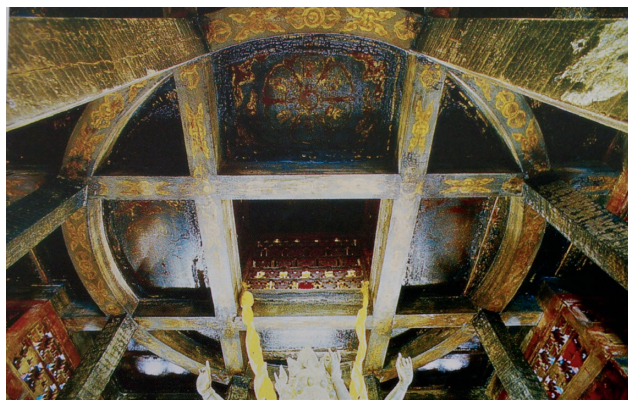


图27 旭光阁木坛城宫殿九宫格

高无上。其余8格绘六字真言，横纵木梁上绘有象征无坚不摧的金刚杵，杵心为道教太极图案。宫殿四门上方，即九宫格边缘下方绘“十相自在”。以上图案皆描金，笔道精细扎实，吉祥如意明显，极具皇家特色。虽然木质坛城的绘画色彩有的已褪色，有的已脱落，但置身其中，仍可想见当年非常华美。

## （二）木制坛城供像与陈设

据嘉庆二年（1797）清宫陈设档案记载，旭光阁木坛城内外均有供像及陈设<sup>1</sup>：

圆亭一座(二层檐外挂)御笔旭光阁陡匾一面。四面门上外挂黄缎帘刷四件,内中供铜镀金上乐王佛一尊,五色哈达五条,前供铜上乐王佛一尊(随佛衣一件)四门供漆木四色护法佛四尊。东牌楼内供紫檀木匣一件(随楠木桌一张),东牌楼外左右供铜镀金嵌玉镶嵌玉佛塔一对。西牌楼外左右供铜镀金嵌玉镶嵌玉佛塔一对。四面迎门设木神台四座(上供)铜镀金护法佛四尊(佛像镶嵌并璎珞俱有伤坏磕碰不全处,随旧五色哈达二十条)。四门金柱挂御笔黑漆金字挂对四副。古铜五供一分(随楠木香几五件)铜香靠炷香一分,灵花蜡烛一分,红金漆香盘一件,松木供桌一张随黄缎桌套一件中设银满达一件,哈达五件,黄缎拜垫一件。

与档案对比,木坛城现仅存中供主尊上乐王佛,其余供像、陈设皆无。〔图28〕根据木坛城现况及《续部总集》62尊曼荼罗仪轨、《鲁易巴62尊胜乐曼荼罗》〔图29〕、《热河》图册等文献资料,绘制了“木坛城内外供像、陈设配置平面图”〔图30〕,下面逐一进行考述。

### 1. 铜镀金上乐王佛(编号A)

上乐王佛又称胜乐金刚,是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母续最重要的本尊之一。此像为木坛城仅存之主尊,高1.06米,四面,每面三睛、十二臂,主臂拥抱头戴花冠,身饰璎珞,一面二臂的明妃金刚亥母,其正脸朝向东方的磬锤峰,双足下依次是铜、木两种质地的须弥座。〔图31〕依据内务府活计档案记载,这尊佛像系仿北京梵香楼所供上乐王佛样式成造<sup>2</sup>：

乾隆三十一年(铸炉处)二月初二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来说,太监长宁传旨,梵香楼北楼下现供上乐王佛一尊,著照样铸造一尊,在热河供奉,先拨蜡样呈览,钦此。

于三月初一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拨得上乐王佛蜡样一尊持进安在养心殿呈览,奉旨照样准造,钦此。

当年,此像前还供有一尊铜上乐王佛(编号B)。

1 《清宫热河档案8》,《普乐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第544页。  
2 《清宫热河档案2》,《乾隆三十一年铸炉处承做热河活计档》,第28页。



图28 旭光阁木坛城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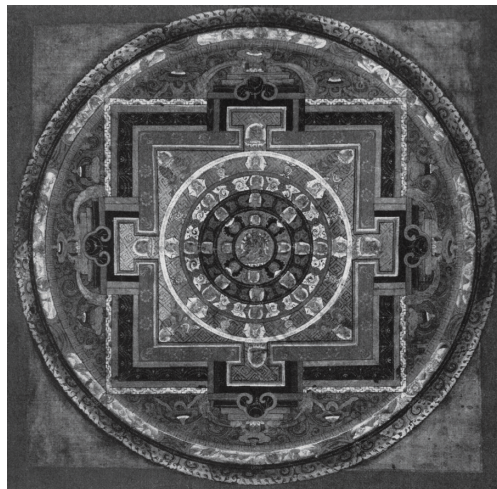


图29 鲁易巴62尊胜乐曼荼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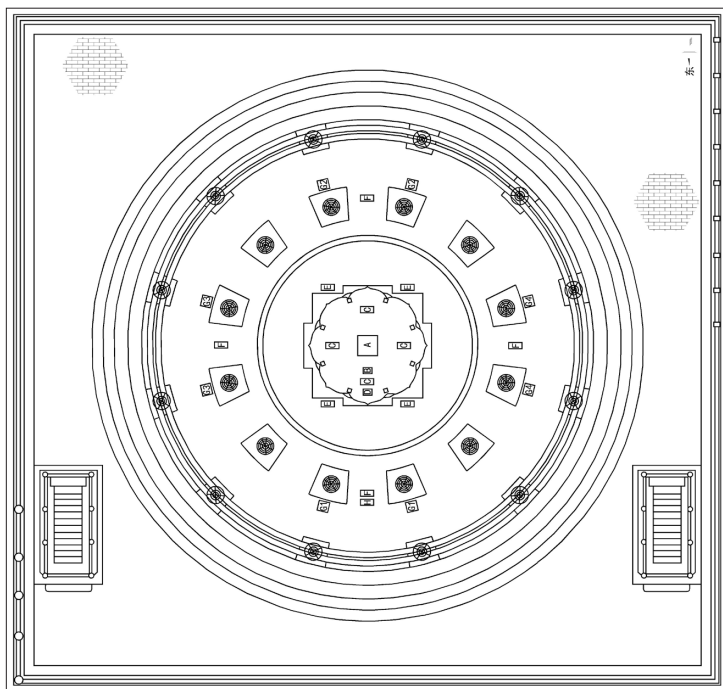


图30 旭光阁木坛城内、外供像陈设配置平面图  
徐振方绘



图31 旭光阁木坛城供奉主尊上乐王佛

## 2. 漆木四色护法佛（编号C）

牌楼四门供“漆木四色护法佛四尊”。若参照《续部总集》记载<sup>1</sup>，四门内亦应供奉四位空行佛母，东门内是蓝色空行女、西门内是红色段生女、南门内是黄色具色女、北门内是绿色拉玛。每位空行母都是一面三目，各有四臂，手中持钺刀、颅器、天杖等法器，呈现站立姿势于中心主尊外围。根据胜乐曼荼罗构造以胜乐与金刚亥母为中心，由内到外依次是大乐、心、语、意、三昧耶五轮，各轮之间呈同心圆排列，均布列多

<sup>1</sup> 张雅静：《续部总集中的胜乐六十二尊曼荼罗》，第500页。

位尊神，推测此区域代表着胜乐金刚坛城之“大乐轮”。

### 3. 紫檀木匣（编号D）

东牌楼内设楠木桌一张，上供紫檀木匣一件，其内何物？笔者推测是乾隆帝的御容唐卡。这是因为在故宫博物院现珍藏着一幅“绢本彩绘普乐寺乾隆佛装像唐卡”<sup>1</sup>，〔图32〕虽然在普乐寺的陈设档案中，并未提到其所在具体殿堂，但参照外八庙其他寺庙陈设档中乾隆帝御容唐卡的所在位置，可发现一些端倪。

首先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普宁寺大乘之阁三层陈设<sup>2</sup>：

（三样楼）三层楼佛前设花梨木琴桌一张，上设铜佛一尊，随数珠一盘，珊瑚佛头四个，金杵四个，内嵌镶金珠，每个三十粒。青绿铜汉鼎炉一件，紫檀座盖嵌玉顶，前设乾隆款瓷珐琅美人瓶二件，内插花二支，紫檀座。紫檀嵌玻璃冠架二件，紫檀匣一件（内盛）高宗纯皇帝画像一轴。

再看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殿陈设<sup>3</sup>：

（妙高庄严殿三层）明间秘密佛一尊……东间乐王佛一尊……西间呀曼达嘎佛一尊，左右紫檀香几二件（上）铜镀金镶嵌盔一顶、蓝锦锭铜镀金钉绵甲一分、黄丝勒甲条一件、青丝条一件、黄缎拜垫一分。面北设小紫檀桌一张（上）圣容一轴（金漆匣盛随铜锁匙），前铜镀金七珍一份、金地洋磁五供一分。

以上两寺所供御容都在本寺的中心主殿，亦都是最高层的核心位置，只是陈放御容的桌、匣不同而已，详见表二。而十分巧合的是，在故宫博物院同样珍藏有“绢本彩绘普宁寺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sup>4</sup>〔图33〕和“绢本彩绘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sup>5</sup>〔图34〕。查阅清宫陈设档案，两寺也仅在大乘之阁三层、妙高庄严殿三层供有乾隆帝御容。据此，笔者认为这两幅唐卡当年就分供于普宁寺与须弥福寿之庙内。以此推之，当年旭光阁木坛城东牌楼内的紫檀木匣里，亦应供奉有乾隆帝御容，即“绢本彩绘普乐寺乾隆佛装像唐卡”。以上三寺核心位置所供奉的御容唐卡，反映了乾隆帝强烈的宗教情感和皇权思想。

表二 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供奉御容桌、匣对照表

寺院名称	殿堂	供桌	木匣	匣内供物
普宁寺	大乘之阁三层	花梨木琴桌	紫檀木匣	高宗画像一轴（绢本彩绘普宁寺唐卡）
须弥福寿之庙	妙高庄严殿三层	小紫檀桌	金漆匣	圣容一轴（绢本彩绘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普乐寺	旭光阁木制坛城	楠木桌	紫檀木匣	未记载（绢本彩绘普乐寺乾隆佛装像唐卡）

1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第542页。

2 《清宫普宁寺档案2》，《普宁寺佛像供器等项清档》，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337页。

3 《清宫热河档案13》，《须弥福寿之庙佛像供器等项清档》，第206页。

4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第540页。

5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第544页。



图32 绢本彩绘普乐寺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绢本彩绘普宁寺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故宫博物院藏



图34 绢本彩绘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故宫博物院藏

#### 4. 铜镀金嵌玉镶嵌玉佛塔（编号E）

木坛城东、西牌楼外左右各供铜镀金嵌玉镶嵌玉佛塔一对。现在木供台上仍存有小孔，大概是当年插放榫类物，以固定佛塔之用。

#### 5. 铜镀金护法佛（编号F）

四面迎门设木神台四座，（上供）铜镀金护法佛四尊。参照《续部总集》62尊曼荼罗仪轨<sup>1</sup>，木坛城牌楼四门位置应由四位空行母来把守，她们右手持颅鼓，左手持天杖，扮演着门神的角色。但经实地观测，笔者发现牌楼四门空间十分窄小，应没有合适的位置供奉木神台。另据陈设档中“四面迎门”的记载来分析，四位空行母可能供奉在木坛城外金柱之间对应四门的位置。据此推测，此区域代表着胜乐金刚坛城之“三昧耶轮”。

#### 6. 御笔黑漆金字挂对（编号G）

陈设档案中记载“四门金柱挂御笔黑漆金字挂对四副”，根据《热河》图册中的老照片〔图35〕



图35 普乐寺旭光阁西侧金柱楹联老照片，《热河》

<sup>1</sup> 张雅静：《续部总集中的胜乐六十二尊曼荼罗》，第502页。



图36 普乐寺宗印殿屋脊八宝图片

拍摄：陈克寅、祈欣

以及《钦定热河志》记载，旭光阁金柱上悬挂楹联内容如下：

面东（G1）：竺乾法示西来意 震旦光圆东向因；

面西（G2）：化城层拱通乾阙 属国环归过月氏；

面南（G3）：花凝宝盖皈真相 云拥祥轮现化身；

面北（G4）：妙演梵乘超最上 广臻法会乐无遮。

以上四副楹联皆由乾隆帝撰写，足见其佛教信仰之虔，佛学造诣之深。其中“广臻法会乐无遮”，从一侧面反映当年此寺举办法会场之宏大。

#### 7. 供桌（编号H）

当年，阁内有供桌一张，上有五供一分，中设银满达一件，黄缎拜垫一件。根据上乐王佛面向东方来推断，木坛城东侧为旭光阁的正方向，因此供桌应供奉在东门迎门位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旭光阁西侧殿门外，可见一体量超大的“供案”——宗印殿屋脊。宗印殿作为普乐寺前半部的主殿，其与东西配殿、钟鼓二楼、山门、天王殿共同组成普乐寺前半部的伽蓝七堂布局。此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殿前中央有雕刻精美的云龙石陛，显示着寺庙的高贵等级。殿内供奉三方佛，两侧供八大菩萨。这座殿堂最精彩的部分在屋顶，正脊中央有一座嵌黄釉琉璃喇嘛塔，两侧嵌饰琉璃八宝饰件：轮、螺、伞、盖、莲花、宝瓶、双鱼、盘长。〔图36〕这八宝作为佛前供器，通常陈放在供桌上，而供在屋脊上真为少见。由于旭光阁内的木制坛城可在殿内设置供案，进行礼拜。但其外围石质城台较高大，宗印殿顶正好是设供的绝佳位置。不仅可以作为石坛城的供案，又节省了建筑周围可利用空间，真是一举多得。

## 四 佛事活动

普乐寺落成后，寺院的开光庆典必不可少，其他相关佛事活动也较为频繁。据记载，此寺的开光庆典共举行两次：第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寺庙落成之时，由章嘉国师主持，三世土观活佛等僧众在普乐寺举行了开光庆典，乾隆帝亲临普乐寺，参加了规模盛大的胜乐会供轮活动。但在清档中，尚未见到关于庆典活动的详细记载。不过，乾隆帝对此寺日后的佛事活动提出具体安排<sup>1</sup>：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02466。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初九日,章嘉呼图克图面圣后,奉旨:从今以后每月十日、二十五日两日,由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出喇嘛,着其往新建之普乐寺诵《胜乐王佛经》。于是遵旨每月十日,二十五日,溥仁寺等三寺共遣喇嘛六十二名,由果芒呼图克图率领、监督诵经,为万岁寿祈福诵经。供佛供物香蜡等银一百八十两。

其中“遣喇嘛六十二名”,与陈设档案通梵门内陈放62本《胜乐王佛经》记载正好相印证,经书就是为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三寺喇嘛诵经之用。由于普乐寺落成后,并不驻喇嘛,乾隆帝亲自核准正副千总各一人、弁兵25名负责守卫。所以普乐寺的佛事活动便从其他三寺派出喇嘛来完成。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这三寺位于避暑山庄外武列河之东,与普乐寺相距不远,前来参加活动亦便。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乾隆帝又谕令授予果芒呼图克图察罕喇嘛庙达喇嘛,夏季驻热河安远庙,冬季进京驻本庙<sup>1</sup>。〔图37〕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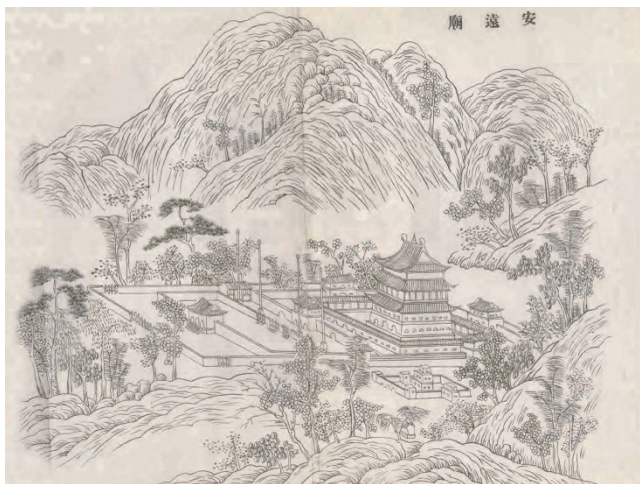


图37 安远庙全图,清《热河志》

所以让果芒呼图克图入驻安远庙,应与其便于到普乐寺主持诵经活动有直接关系。

果芒呼图克图即是“敏珠尔呼图克图”,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在清代的相关文献资料里,也有“赞布诺门罕”“敏珠尔诺门罕”“果蟒呼图克图”等多种称呼,实际均为一<sup>2</sup>。从档案中所说乾隆四十八年来判断,应为三世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他是青海蒙古族人,在乾隆三十一年到多伦诺尔拜见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请为引见,驻京效力。于乾隆三十二年获准进京供职。乾隆四十六年,被封为净照禅师,赐银印。乾隆五十年(1785),在北京圆寂。因此,敏珠尔活佛在乾隆三十二年入京“供职”的工作之一便是负责组织、带领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三寺喇嘛到普乐寺进行祈福万寿诵《胜乐王佛经》活动。

普乐寺每月诵胜乐王佛经的费用每年都有拨付。如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分应用<sup>3</sup>:

五色高绸两副、五色缎条二两、吉祥草六支、坛城大佛一尊、孔雀翎六支、粳米十斗、箭一支、宝石面子二两、大哈达一个、藏红花十两、五谷粮一斗、大殿佛三尊、大哈达三个、菩萨八尊、小哈达八个、东西配殿佛六尊、小哈达六个、每月念经二次,一年共用点灯黄油二百三十斤、紫草三斤、五色珠尔线二两、三样糖三斤。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3-18-009-000046-0003,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2 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中国藏学》2011年第S2期。

3 乾隆三十八年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13-002-000030-0112-002。

普乐寺的第二次开光庆典活动是在嘉庆年间，这是因为嘉庆帝在位期间，用蒙古各部献上的祝寿银曾对普乐寺进行了大修。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普乐寺殿宇维修工程全部完竣。八月初三日，嘉庆帝从京城抵达避暑山庄，初四日便亲行拈香，并命（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与堪布喇嘛等24人，在普乐寺啐开光经一日。参加啐经的人员包括<sup>1</sup>：

章嘉呼图克图一名，随围扎萨克喇嘛一名，堪布喇嘛二名，随围达喇嘛二名，随围苏拉喇嘛一名，跟随呼图克图之苏拉喇嘛二名，随围格隆八名，小僧七名，员外郎一员，笔帖氏四员。

以上人员一日吃食，全部由茶膳房按例安排。在开光活动中，应用物品可谓繁多，清单开列见（表三）<sup>2</sup>。

表三 普乐寺开光经需用物品清单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大白手帕	三个	干酒	一斤
小白手帕	二十个	棉花	二两
孔雀翎、吉祥草	各五支	白黑糖	各一两
缎条	一钱	白蜂蜜	二两
松柏枝末	五斤	箭	四支
柱香	三束	杨木箭杆	四支
黑白芸香白檀紫降	各二两(烧炉用)	班次饽饽桌	一张(随垫桌)
各样干果	五盘	七星饼	十五碗(每碗十五个)
苹果	十五碗(每碗高一尺五寸)	麦	十斤
酸奶甜奶皮	各一碗	奶油	十斤
重三两饅首	六十个	小灯草花	六十支
高香	两束	京红花	一两
丁香	一钱	各样干花	一两
箭斗	一个(油红色)	时花	二把
白老米	一斗八升 (装前斗用)	撒花白老米	一斗二升
白玉蜂糕	一块(重四十斤)	五色线绳	一条(长五丈粗三分)
白粗布	五尺	白细布	一匹

1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内务府来文，皇上亲行拈香着章嘉呼图克图堪布等人在普乐寺开光经需用物品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13-002-000107-0043。

2 嘉庆二十四年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13-002-000107-0043。

(续表三)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小白手帕	两个(拴宝瓶镜子用)	五色大手帕	五个
五色杭绸	各一丈二尺五寸	茜红白蜡墩子	三对(每对重十二两)
茜红素蜡	三对(每对重一斤)	羊油蜡	四斤
做巴苓	九盘(每盘需用炒面三斤)	羊腰油	二斤
花手帕	一个	木柴	三斤
黑炭	五斤	八仙高桌	四张
暂用小经桌	二十四张(随黄布套)	呼图克图坐小床	一张(随坐褥床套一分)
大小铜镜	各一面	铜灯	六十盏
铜水钟	一百二十个	锡柿壶莲壶	各一把
黄彩绸	十匹	铜杵子	一个
磁七寸盘	十个	裁缝	一名
彩子匠	一名		

从上表可以看出，嘉庆年这次普乐寺落成开光活动虽仅有喇嘛24名，但所用物品齐全，丝毫不马虎。

此外，根据本文第二部分提及的“乾隆帝特意命令北京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了八幅金刚佛画，要求在他拈香或举办道场之日，在坛城上下券门悬挂”，可知乾隆帝在此寺还有拈香、举办道场的佛事活动。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圆明园及出外所用香账为例，这一年，乾隆帝曾在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八月十三日、八月十五日到普乐寺拈香，均使用“头号红香二支”。再如在乾隆四十年（1775）的六月初二日、七月初六日、八月十三日、八月十五日到普乐寺上香，均使用“头号红香二支”。从时间上看，他在热河期间，每月十五“望”日和八月十三日的诞辰日，大多会到普乐寺拈香。

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四十年七月初六日的拈香途中，乾隆帝心系农事，当他看到避暑山庄外武烈河东岸高低错落、黄绿相间、长势繁茂的庄稼时有感而发，遂写下《渡河普乐寺瞻礼》诗一首，其中有：“西成可望为额庆，时尚遥虞望难副。普乐之意原在斯，六波罗蜜非所究”<sup>1</sup>之句，强调了“普乐”的真正含义，就是希望看到丰收在望，百姓额手称庆，普天同乐的景象，至于佛教中的“六波罗密”并非他所要探究的。此诗是其民本思想的生动反映。

关于乾隆帝在普乐寺举办道场的具体时间尚未见到档案记载，但其过程与举办时间应如圆明园的清净地一样相对固定。清净地又名月地云居，其作用相当于紫禁城内的中正殿。这里举行的胜乐金刚道场是在每年的四月初二到初十日，过程包括唵上乐王佛经、堆画坛城、装宝瓶、跳步踏四个环节。因此推测，普乐寺胜乐金刚道场的过程也需要完成以上四个环节，具体内容，此不赘述。

1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74页。

普乐寺的相关佛事活动，还满足了边疆诸藩入觐的宗教信仰需求，如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年（1785）所作《普乐寺》一诗诗注中说：“每岁各蒙古王公、扎萨克及卫拉特各部分班来觐者，无不仰瞻欢喜，如游春台化宇。”<sup>1</sup>在瞻礼活动中，还可见到诸多高僧的身影。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世嘉木样从京城前往热河，受到热河僧众的欢迎慰问。会见了各寺院僧人和准噶尔部的人众，并说法传经。之后巡礼布达拉（普陀宗乘之庙）、伊犁苏木（安远庙）、胜乐颇章（普乐寺）等寺院的佛像亲奉献供品，并发利乐佛法及众生的广大誓愿<sup>2</sup>。又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启程入京朝觐，祝厘乾隆帝七十大寿，次年七月抵达热河。七月二十七日，班禅大师一行在皇六子的陪同下莅临普乐寺“传授佛法，献供哈达，散吉祥花”。离开普乐寺后，途中为汉蒙信徒摩顶<sup>3</sup>。

可见，普乐寺的佛事活动可谓“政教兼融”，既满足了清帝的宗教信仰，又充满了政治色彩，密切了清中央政权与边疆各部的关系。

## 五 结 论

通过对普乐寺坛城群房、八塔、木制坛城及相关供像、陈设的考述，可知当年此坛城供有18位尊神，其中上下券门悬挂金刚佛画8幅，旭光阁木制曼荼罗内外供像10尊。佛塔共12座，包括二层方城的八塔以及旭光阁木制坛城内的4座玉塔。如果与《续部总集》收录的62尊曼荼罗图相比，普乐寺坛城是一种相对简化的曼荼罗形式，其构造只表现了胜乐62尊曼荼罗五轮中之“大乐轮”与“三昧耶轮”。但它体量宏伟，外观华美，从整体构思到设计上，都体现出皇家风范。特别是普乐寺东侧的磬锤峰与普乐寺主尊胜乐金刚，达到“人天咸遂皈依”之目的。寺内的后部坛城与旭光阁木制坛城既是完整的统一体，又可独立成章，可谓坛城之中有坛城。而将宗印殿顶作为供案，顶饰八宝的做法别出心裁。从自然天成的外部环境到坛城的体量及内部布局、陈设，普乐寺坛城可谓国内罕见。

作为一座御用道场，从坛城布局到群房的使用，强调了建筑的宗教功用与舒适性，而在普乐寺举办的开光庆典、诵《胜乐王佛经》、瞻礼、拈香及举办胜乐金刚道场等佛事活动，更进一步说明胜乐金刚坛城主要满足于清帝信仰及其政治需要，蕴含了乾隆帝希求“济度众生”“普天同乐”之愿望。

[作者单位：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

1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3页。

2 陈庆英：《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二世嘉木样·贡却乎久麦昂吾东行评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967页。

3 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3页。



